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336–344.**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31sttnt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唐宋时期宁波纺织品贸易研究：从“唐绫”到“海上丝路”的枢纽

李师漫（Li Shiman）

摘要：唐宋之际，明州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腹地纺织业以及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逐步成长为东亚纺织品贸易的核心枢纽。本文将系统梳理这一时期宁波纺织品贸易的历史图景，分析其出口商品结构、海外市场分布以及贸易机制，揭示明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独特地位。唐宋时期宁波纺织品贸易的本质，并非单纯的商品输出，而是一场以纺织品为载体的“商品–制度–文化”三位一体的东亚体系建构过程。纺织品既是贸易标的物，更是技术传播的媒介、制度创新的催化剂和东亚文化认同的纽带。明州作为这一过程的枢纽，其历史意义超越了经济层面，深刻塑造了东亚区域文明的互动格局。

关键词：唐宋；明州；纺织品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东亚技术传播

作者简介：李师漫，讲师，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博士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方向古代纺织史及现代针织技术。电子邮箱：192068826@qq.com。

Title: A Study on Textile Trade in Ningbo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rom “Tang Ling” to the Hub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bstract: Why did Ningbo (known as Mingzhou in ancient times) emerge as a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textile trade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is question pertains not only to the study of regional economic history but also to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rade system.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the port of Mingzhou, leveraging its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developed hinterland textile industry, and sophisticated maritime trade management system, gradually rose to become a pivotal hub for textile trade in East Asia.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Ningbo’s textile trade during this period, analyzing its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overseas market distribution, and

Received: 30 Mar 2026 / Revised: 14 Sep 2026 / Accepted: 27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trade mechanisms, thereby revealing Mingzhou's unique role with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e essence of Ningbo's textile trade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as not merely the export of goods, but a tripartite "technology-institution-culture" process of East Asian system construction, with textiles as its carrier. Textiles were not only trade commodities but also vehicles for technological dissemination, catalysts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bonds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dentity. As the hub of this process, Mingzhou'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ranscended the economic sphere, profoundly shaping th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within East Asian region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Mingzhou; textile trade; Maritime Silk Road; technological dissemination in East Asia

Author Biography：Li Shim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Zhejiang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olds a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ncient textile history and modern knitting technology. Email: 192068826@qq.com.

明州港的兴起，首先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发达的腹地经济。明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滨临东海，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于此，形成天然的深水良港。自唐代起，明州即是对日本、朝鲜半岛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至宋代更成为朝廷指定的对高丽、日本官方贸易的唯一合法口岸（林士民 27–49）。港口腹地则以浙东平原为核心，土地肥沃，蚕桑业发达，纺织原料供应充足。据成化《宁波郡志》载，明州所辖各县“桑麻遍野，织纴之声相闻”（杨寔（明）卷四），为纺织品出口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正是这种“港口—腹地”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使明州得以在唐宋之际迅速成长为海上丝绸之路纺织品贸易的核心枢纽（冯盈之、胡玉珍 11–52）。

一、唐绫东渡：唐代明州纺织品贸易的兴起

1.“纺丝巷”与官营织造

唐代明州城内有一条名为“纺丝巷”的街巷，位于今宁波市开明街与南大路交会处的三角地带，是当时官营织锦坊的所在地。《光绪鄞县志》载：“鄞自唐至宋皆贡绫。巷盖为贡绫时，杼柚郡聚之”（戴枚，等，（清），卷三）。“杼柚”是织布机上管经线和纬线的两个部件，这里借指织机、织布，“杼柚郡聚”意味着大批织机聚集于此，形成官营纺织生产的中心。

唐代明州官营织锦坊生产的丝织品种类繁多，主要有绫、锦、绢、绸等数十品，其中以吴绫和交梭绫最为著名。这些贡绫专门用于皇室贵族服装制作，也供岁时赏赐之用，以其“轻飘精美，鲜艳夺目”而著称，朝中君臣赞其“质量之好，世上少有”①。

2.“唐绫”的海外传播

唐代宁波生产的丝绸销往日本后，被称为“唐绫”，受到日本朝野的广泛喜爱。日本学者藤原定家在《明月记》中记载：“近年来，无论上下各色人等，均喜穿‘唐绫’，于是命都城织工仿织‘唐绫’”①。这一记载不仅说明“唐绫”在日本的流行程度，也反映出明州丝织品对日本纺织技术的影响——日本都城织工开始仿制中国的“唐绫”。唐贞元二十年（804 年），日本遣唐使从明州港回国时，带走了大批精致丝织品，明州港由此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的终点”。



图 1 日本正仓院藏红地对鸳鸯花鸟纹锦②

Fig 1.The Japanese Shosoin collection features a red ground brocade with mandarin duck and flower patterns.

唐绫贸易的“溢出传播”。唐代明州纺织品对日输出，表面上是遣唐使携归的朝贡行为，实则构成了一种“溢出于政治独立传播”的早期形态。贡品绫罗作为“国家礼物”进入日本宫廷，旋即引发热潮。日本各类文献中有多处对唐绫的描述，如表 1 所示。公元 907 年，唐朝覆灭，此时日本已停止派遣遣唐使（李广志 100–200）。在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的时期，平安王朝与中国国家间的交往已经中断，但民间贸易也始终未能断绝。丝绸，作为最负盛名的传统中国特产，仍然源源运往日本，成为上流贵族的争相竞买的奢侈品。锦、绫、罗、绮等中国丝织品一直代表最高级服装的材料，是地位、身份和财力的象征。日本朝廷由右大臣藤原朝臣师辅让蒋承勋给吴越王带去的回信中写道：“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然而志绪或织丛竹之色，德磐或引沈檀之熏，受之则虽忘玉条，辞之恐谓嫌兰契，强以容纳，盖只感君子亲仁之义也。”由此可见虽国家宪令禁止丝绸贸易，但日本民众始终无法忽视对唐绫的喜爱。

著作	对唐绫的描述
清少纳言《枕草子》	“皇后身上穿着好几层白衣，其上又加袭两件红色唐土产的绫质上衣。”
林文月译清少纳言《枕草子》九十二、一八二、二五六	“（中宫）里面穿着柳绿色的唐绫褂子，染成葡萄色的五层衣裳，赤色唐衣，白底青纹的唐罗上绣着金银象眼图案的裳裙。这一切种种的色泽配合，自非寻常一般所可比拟。”
《荣华物语》、《宇津保物语》	“绫分为素绫和花绫，传统法花绫一般是斜纹地组织上起斜纹花的单层暗花织物”；“罗是全部或部分采用条形绞经组织的透孔丝织物”；“绚烂到极致的红色唐锦，在当时的平安王朝，是只有皇后才能驾驭的珍贵之物。”
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第八回《花宴》（丰子恺，第八回）	“他身穿一件白地彩纹中国薄绸常礼服，里面衬一件淡紫色衬袍，拖着极长的后裾，夹在许多身穿大礼服的王公中间，显然是个风流潇洒的贵公子模样，大家肃然起敬。”
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第二十九回《行幸》（丰子恺，第八回）	“他（内大臣）自穿淡紫色裙子，上罩白面红里的衬袍，衣裾极长，故意装出悠闲自得的模样，令人见了觉得光艳夺目。六条院太政大臣则身穿白面红里的中国绫罗常礼服，内衬当时流行的深红梅色内衣。那无拘无束的贵人模样，其美更是无可比拟。他身上仿佛发出光辉。内大臣的严装盛饰，到底比不上他。”

表 1 《源氏物语》中对于唐绫的记载

Table 1. Records of Tang twill silk in *The Tale of Genji.*

二、市舶时代：宋代明州纺织品贸易的鼎盛

入宋以后，明州的海外贸易更加繁盛。宋代诗人梅尧臣在《送王司徒定海监酒税》中写道：“悠悠信风帆，杳杳向沧岛。商通远国多，酿过东夷少”，生动描绘了明州港商船往来、远航海外的繁忙景象。

宋代明州的海外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除日本、高丽外，还发展了与东南亚、南洋及阿拉伯各国的通商贸易，包括波斯（今伊朗）、占城（今越南境内）、真里富（今柬埔寨）等地。[③]北宋航济亭石文记载：

> “北宋淳化三年（992），两浙市舶司由杭州迁至定海县（镇海），专管海商贸易，凡大食（阿拉伯）、阇婆（印尼）、占城（越南南部）、真里富（柬埔寨）等海外诸国通商，均经镇海口至明州交易。”

宁波市区至今保留的来远亭、波斯巷等历史遗迹，正是这段繁华贸易史的见证。

南宋时期，从明州港出口日本最主要、数量最大的商品便是丝绸。频繁的丝绸贸易深刻影响了日本的丝织业发展——日本的博多（今福冈）因与明州贸易往来密切，成为日本古代丝织业的中心。镰仓时代，从宋代传入的丝织技术在博多盛行，形成了著名的“博多织”。[③]

从高丽进口明州的商品中，纺织品占有重要地位。据《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记载，从高丽进口的“粗色”商品包括“大布、小布、毛丝布、紬（绸）”等布料。其中，高丽的苎麻布品质极佳，“绝品的高丽苎麻布洁白如玉，王公贵族都会穿着”。[③]

两宋时期，受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朝廷对外开放政策扶持以及东南沿海手工业蓬勃发展的多重驱动，明州凭借优越的江海区位与港口条件，逐步跃升为宋代东海航线与南洋航线的核心枢纽港口，海外贸易规模、通商范围与经贸层级均远超唐代，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始发港与商品集散地，港口商贸活动呈现常态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发展特征（金城、刘恒武 57–72）。北宋文人梅尧臣《送王司徒定海监酒税》中“悠悠信风帆，杳杳向沧岛。商通远国多，酿过东夷少”的诗句，并非单纯的写景抒情，而是对北宋明州港远洋商船络绎不绝、中外商贸往来频繁的真实写照，直观印证了当时明州与海外诸国商贸交流的繁荣态势（金城、刘恒武 57–72）。

相较于唐代以日、朝为核心的近海贸易格局，宋代明州的海外通商版图实现了全方位拓展，形成了覆盖东北亚、东南亚乃至西亚阿拉伯地区的立体贸易网络。北宋淳化三年（992），朝廷将两浙市舶司自杭州迁至定海县（今宁波镇海），管辖浙东、浙西地区海外商贸事务，规范外商通商、货物查验、关税征收等流程，极大提升了明州港的外贸地位与运营效能（张华琴 27–39）。据北宋航济亭石刻文献记载，高丽、日本等海外诸国的商队与商船，均需经由镇海口驶入明州主城区完成贸易交割，明州也由此成为两浙地区对接南洋、西洋贸易的核心口岸（纪昌兰 204–208）。宁波城区现存的来远亭、波斯巷等历史遗存，是宋代阿拉伯商人、南洋客商长期聚居通商的实物见证，清晰勾勒出明州国际化商贸港口的历史风貌。

南宋定都临安后，浙东地区成为王朝经济核心圈层，明州海外贸易进一步提质扩容，进出口商品结构愈发精细，对海外区域产业发展形成了深远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对日贸易体系中，丝织品是明州出口的核心大宗商品，品类涵盖生绢、白绫、花罗、素绸等数十种，凭借精湛的织造工艺与稳

定的供给规模，长期占据宋代对日出口贸易的首位（张华琴 27–39）。高频次的丝绸商贸往来与技术传播，直接推动了日本丝织产业的革新与升级。日本博多港（今福冈）依托与明州的紧密商贸纽带，集聚了大量宋代丝织工匠与先进织造技艺，逐步发展为日本中世纪最重要的丝织产业中心。至镰仓时代，传入日本的宋代提花、印染、织造等技术在博多落地生根、本土化发展，最终孕育出兼具中式工艺特色与本土风格的经典织造工艺“博多织”，成为中日海上经贸与技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成果（刘丽娴、王明坤 197–198）。

在对高丽的贸易往来中，纺织品是高丽输入明州的核心大宗商品，与香料、药材、矿产共同构成高丽对华贸易的主体品类，极大丰富了宋代浙东地区的商品市场体系。南宋《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作为宋代明州官方权威商贸典籍，明确记载高丽输入明州的“粗色民用商品”包含大布、小布、毛丝布、紬绸等各类棉麻、丝织制品，品类齐全、流通量大。其中高丽特产苎麻布质地细密、色泽莹润，纺织工艺独具特色，极品高丽苎麻布洁白无瑕、质感温润，远超本土同类织物，成为宋代江南贵族阶层追捧的高端服饰原料，广泛应用于礼服、帷幔、配饰等制作，深刻影响了南宋浙东地区的服饰审美与手工业消费风尚。双向互通的纺织品贸易，不仅构建了宋与高丽、日本稳定的经贸体系，更实现了东亚丝织技艺的双向交融，推动了整个东亚沿海手工业体系的协同发展。

三、宋代明州纺织业的转型：从官营到民间

浙江丝绸产业在封建社会时期经历了三次大发展，分别出现在唐朝、宋朝和明朝。宋代明州纺织业的发展，是这三次大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这一时期，明州不仅延续了唐代的官营织造传统，还形成了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

1. 生产技术：丝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品种更加丰富

官方赋税数据反映的丝织品品类增加——宋代明州丝织品品种的丰富，首先体现在官方赋税统计中。《宝庆四明志》详细记载了南宋时期明州各县的夏税征收情况，其中涉及多种丝织品类的数量统计。以慈溪县为例，夏税征收“绢一万七百一十六匹一丈五尺六寸五分六釐”“紬二千六百八十三匹二丈八尺六寸八分”“绵二万六百七十二两三钱七分四釐”。定海县的征收情况同样可观：“绢九千五百三十一匹九尺八寸三分”“紬二千三百二十九匹二丈七尺九寸八分”“绵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一两四钱六分”（罗濬，（宋），卷十七）。税赋记录中明确区分“绢”与“紬”两类丝织品，表明宋代明州丝织业已形成较为细致的品类划分，这与唐代以贡绫为主的单一格局形成鲜明对比。

官方文献对纺织物产的系统记载——成化《宁波郡志》卷四《土产考》中列有丝、绵、绸、绢、麻、棉布、腰机布、麻布等 18 种纺织产品。嘉靖《宁波府志》卷十二《物产》中“货之属”目，列出丝、绵、绢、绸、棉布、麻布、木棉、葛布等，并特别注明“出慈（慈溪县）象（象山县）者佳”。这种系统性的物产记录，说明宋代宁波丝织品的品类已远超唐代。

“物产书写”与地方认同的建构——宋代地方志对纺织物产的系统记载，并非单纯的客观记录，而是一种主动的“地方认同建构”行为。成化《宁波郡志》列 18 种纺织产品，嘉靖《宁波府志》细列并注明“出慈象者佳”——这种书写策略将纺织品从“物”转化为“地方标志”。通过方志的文本化，纺织品成为明州在帝国版图内确立经济身份、在海外贸易中塑造品牌认知的文化符号。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宋代明州的纺织品贸易，其竞争力不仅来自产品本身，更来自方志编纂所推动的“品

牌化”过程。明州纺织品在海外市场的成功，与地方志书写所构建的“优质产地”形象之间，存在值得深究的互动关系。

2. 产业规模：纺织生产从官营向民间扩展，形成较为广泛的产业基础

蚕桑专业户的大量涌现——宋代江浙地区出现了许多专门经营蚕桑纺织的专业户。在明州周边地区，这类专业户已形成规模化的经营模式。湖州西部“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严州“州境山谷居多，地狭且瘠”，当地人“惟蚕桑是务”；婺州义乌县的山谷之民以“织罗为生”（王昊 21–45）。这些专业户的出现，标志着民间纺织业已从家庭副业转变为专门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宋人方岳有诗描述徽州歙县的农家：“东家打麦声彭魄，西家缫丝雪能白……东家麦饭香扑扑，西家卖丝籴新谷”，这里的“西家”便是以缫丝为生的专业户。民间纺织业的专门化，正是产业基础广泛形成的重要标志（王昊 21–45）。

生产工具的革新与民间普及——宋代民间纺织业的发展，与生产工具的革新密不可分。宋代出现了脚踏纺车和水转大纺车，尤其是水转大纺车——利用水力驱动的纺纱合线机，是世界上最早以水为动力的纺织机械（黄能馥、陈娟娟 60-200）。在南宋著名国画《耕织图》上，就有一部大型提花机，上有挽花工，下有织花工，相互呼应，正在织造结构复杂的花纹。这些先进纺织工具的发明和应用，使民间纺织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为产业基础的广泛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撑（图 2）。



图 2 南宋耕织图[④]

Fig 2: The Farming and Weaving Map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专业户经济”与唐宋变革论的新解读——宋代明州周边蚕桑专业户的涌现，为理解“唐宋变革论”提供了纺织业视角的实证。传统观点认为唐宋变革的核心是土地制度、赋税结构和士人阶层的变迁。本文认为，纺织业从官营向民间的转移，与专业户经济的形成同步发生，这构成了另一条重要的变革线索——从“官府需求驱动”向“市场利润驱动”的转型。专业户的出现意味着纺织生产不再单纯服务于贡赋，而开始响应海外市场信号。这一转型的核心动力，正是宋代明州海外贸易的扩展。换言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市场需求，催生了浙东地区的纺织专业化生产。这一发现将唐宋变革的宏观叙事与区域经济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市场革命”提供了新路径。

3. 贸易网络：以市舶司为管理核心，建立了规范的海外贸易制度

宋代明州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市舶司的设立。据《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记载：“皇朝因之，置务于浙、于闽、于广。浙务初置杭州，淳化元年徙明州，六年复故。咸平二年，杭、明二州各置务”（罗濬，（宋）卷六）。这段记载清晰地勾勒出明州市舶司的设立过程：淳化元年（990 年）两浙路市舶司首次迁至明州，至咸平二年（999 年），明州正式单独设立市舶司，与广州、杭州并称北宋“市舶三司”[⑤]。

南宋时期，市舶机构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宝庆四明志》载：“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贾舶至澉浦，则杭务废。宁宗皇帝更化之后，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这表明南宋时明州（后改称庆元）成为唯一允许与高丽、日本进行官方贸易的港口，其市舶管理机构获得了垄断性的贸易管理权限。

市舶制度的“双重功能”——贸易管理与东亚秩序构建：宋代明州市舶司的制度创新，其意义远超贸易管理本身，而是参与了东亚区域秩序的构建。从制度史角度看，明州市舶司经历了从“置务”到“专置提举官”再到“惟庆元得受而遣焉”的演变，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管理效率优化，而是宋王朝对东亚贸易“通道”的战略选择。南宋将明州设为对高丽、日本的唯一合法贸易港口，意味着纺织品贸易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管理。这种“贸易通道集中化”策略，使纺织品贸易成为维系高丽、日本与南宋关系的战略纽带。高丽使节经明州入宋、日本商船泊明州港，纺织品既是贸易商品，也是外交礼物。明州由此成为“商贸-外交”双重功能的复合节点，其历史地位超越了单一的经济功能，成为南宋东亚秩序构建的关键支点。

四、结论

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唐宋时期明州的纺织品贸易，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技术和文化的传播。日本的“博多织”直接受到宋代丝织技术的影响；高丽的苎麻织造技术也与明州的交流密切相关。明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东亚纺织技术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经历了从唐代“海上丝路东方的终点”到宋代“商舶往来，物货丰衍”的转变。纺织品贸易是这一转变的核心内容。明州港以其发达的腹地纺织业、先进的造船技术、规范的贸易管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纺织品贸易的枢纽港。

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唐宋时期宁波纺织品贸易的历史，是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活态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宁波启动“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纺织服装被列入重点发展的“3511”产业体系。回顾唐宋时期明州纺织品贸易的辉煌历史，对于理解宁波纺织产业的文化底蕴、推动当代纺织服装产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明州何以成为纺织品国际贸易的中心？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唐宋宁波纺织品贸易的历史，本质上是一场以纺织品为载体的“技术-制度-文化”三位一体的东亚体系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机制：

第一，技术溢出机制。唐代贡赐贸易催生了“唐绫”东渡与日本仿制，实现了中国纺织技术在东亚的“制度性传播”，并开启了日本式的“在地化创新”。

第二，地方认同机制。宋代方志对纺织物产的系统书写，将纺织品塑造为明州的经济身份标识，形成了“品牌化”的早期形态。

第三，市场驱动机制。专业户经济的出现标志着纺织业从“官府需求驱动”向“市场利润驱动”的转型，海外市场需求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

第四，秩序构建机制。市舶制度的演进使纺织品贸易成为南宋东亚秩序构建的战略工具，明州由此成为“商贸-外交”双重功能的复合节点。

这四种机制的叠加与互动，使明州纺织品贸易的繁荣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现象，成为理解唐宋时期东亚文明互动的一把钥匙。纺织品既是贸易标的物，更是技术传播的媒介、制度创新的催化剂和东亚文化认同的纽带。明州作为这一过程的枢纽，其历史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商品的集散地，更是技术、制度与文化的“转换器”——将江南的纺织技术转化为东亚的共享文明成果，将市场的商业需求转化为区域秩序的制度安排，将地方的物产书写转化为国际的品牌认知。这正是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的深层价值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校级课题唐宋时期宁波纺织品贸易研究：从“唐绫”到“海上丝路”的枢纽（项目编号：2026-1C-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 Shim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0596-3154.

注解【Notes】

①王佳、冯盈之、高曙明、刘勤奋：“宁波衣文化的岁月传承”，《宁波日报》党史·方志，2017 年 4 月 17 日，第 11 版。

②图片引自陶晶雯：《源氏物语》中的中国丝织品，《看历史》，2017 年。

③宁波晚报：“800 年前，宁波进口的洋货有哪些？”，2017 年 6 月 26 日，A2 版。

④图片引自邝璠（明）：《便民图纂（十六卷）》。文物出版社，2018 年。

⑤陈青：“明州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城”，《宁波日报》文体新闻，2017 年 6 月 1 日。

引用文献【Work Cited】

戴枚等：《鄞县志》卷三“纺丝巷条”，清。

[Dai, Mei, et al. *Yin Xian Zhi, vol. 3*, “Fangsi Xiang Tiao,” Qing Dynasty.]

丰子恺（译）：“第八回 花宴”，紫式部，《源氏物语》，2019 年，https://book.qq.com/book-read/25658214/13。

[Feng, Zikai, translator. “*Chapter 8: The Flower Banquet*.” *The Tale of Genji*, by Murasaki Shikibu, 2019, https://book.qq.com/book-read/25658214/13.]

冯盈之、胡玉珍：《风从海上来：宁波服饰时尚流变》，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 年。

[Feng, Yingzhi, and Hu Yuzhen. *Feng Cong Haishang Lai: Ningbo Fushi Shishang Liubia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22.]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 年。

[Huang, Nengfu, and Chen Juanjuan. *Silk China 7,000 Years*. China Textile Press, 1997.]

纪昌兰：《宋代明州航济亭设置时间考辨》，《中国史研究》，第 2 期，2020 年，第 204–208 页。

[Ji, Changlan. "A Textual Study of the Establishment Date of the Hangji Pavilion in Ming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no. 2, 2020, pp. 204–208.]

金城、刘恒武：《宋代宁波的港口、航路以及对外航海贸易》，《中国港口》，第 S1 期，2022 年，第 57–72 页。

[Jin, Cheng, and Liu Hengwu. "Port, Maritime Route, and Foreign Trade of Ningbo in Song Dynasty." *China Ports*, no. S1, 2022, pp. 57-72.]

邝璠：《便民图纂》十六卷，文物出版社，2018 年。

[Kuang, Fan. *Bianmin Tuzuan*, 16 vols.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8.]

李广志：《日本遣唐使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 年。

[Li, Guangzhi. *A Study of Japanese Envoys to Tang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25.]

林士民：《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海洋出版社，1990 年。

[Lin, Shimin. *The Famous Port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Mingzhou*. China Ocean Press, 1990.]

刘丽娴、王明坤：《中日文名互鉴的工艺文化缩影——博多织源流考》，《大众文艺》，第 11 期，2020 年，第 197–198 页。

[Liu, Lixian, and Wang Mingkun. "A Microcosm of Craft Culture in Sino-Japanese Mutual Learning: Tracing the Origins of Hakata Ori." *Dazhong Wenyi*, no. 11, 2020, pp. 197-198.]

罗濬：《宝庆四明志》卷十七，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8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

[Luo, Jun. *Baoqing Siming Zhi, vol. 17. In J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vol. 487*,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3.]

清少纳言：《枕草子》，林文月译，译林出版社，2021 年。

[Sei, Shōnagon. *Makura no Sōshi*. Translated by Lin Wenyue, Yilin Press, 2021.]

陶晶雯："《源氏物语》中的中国丝织品"，《看历史》，2017 年。

[Tao, Jingwen. "Genji Monogatari zhong de Zhongguo Sizhipin." Kan Lishi, 2017.]

王昊：《中国经济史评论》2022 年第 3 辑（总第 17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

[Wang, Hao. *Chin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22, no. 3* (total no. 17).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2.]

杨寔：《宁波郡志》卷四"土产考"，明。

[Yang, Shi. *Ningbo Jun Zhi, vol. 4*, "*Tuchan Kao,*" Ming Dynasty.]

佚名：《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市舶"，元。

[Anonymous. *Zhiyuan Siming Xuzhi, vol. 5, "Shibo,*" Yuan Dynasty.]

张华琴：《宋元时期宁波城区"海丝"遗存考古研究》，《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刊专辑》，第 S2 期，2020 年，第 27–39 页。

[Zhang, Huaqin.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Relics in Urban Area of Ningbo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the China Port Museum*, no. S2, 2020, pp. 27-39.]

周赳、金诗怡："封建社会时期浙江丝绸产业的三次大发展"，《丝绸》，第 58 卷，第 1 期，2021 年，第 114–122 页。

[Zhou, Jiu, and Jin Shiyi. "Study on Three Great Developments of Zhejiang Silk Industry in Feudal Period of China." *Journal of Silk*, vol. 58, no. 1, 2021, pp. 114–122. DOI: https://doi.org/10.3969 /j.issn.1001-70031.2021.01.017]